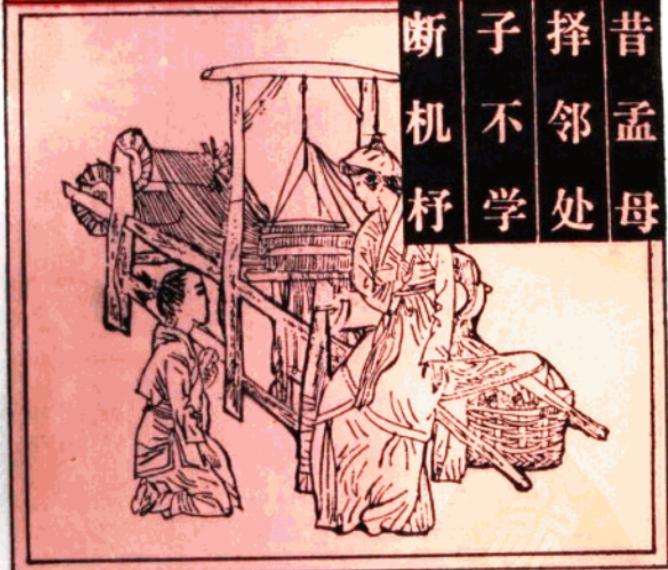


谢励武 王子民/著

中国蒙学 精华研究

断机杼
昔孟母
择邻处
不学子



ZHONGGUOMENGXUE
JINGHUAYANJIU
ZHONGGUOMENGXUEJINGHUAYANJIU

河南大学出版社

目 录

· 引论 ·

- | | |
|----------------|--------|
| 中国蒙学精华概述..... | (1) |
| 蒙学传统与整体教育..... | (9) |
| 蒙养教育论溯源..... | (23) |

· 研论 ·

- | | |
|------------------------|---------|
| 朱熹与教育改革 | (36) |
| 王应麟童蒙教育观 | (57) |
| ——《三字经》、《小学绀珠》的综合教育 | |
| 许衡的整体教育构想及实践 | (73) |
| 综合化·和谐化·规范化 | (84) |
| ——王明阳论儿童教育 | |
| 明代“王学”流派主张快乐教学 | (94) |
| 颜元论劳动教育 | (100) |
| 李塨的整体教育思想 | (111) |
| ——关于《小学稽业》、《小学韵语》的深层思考 | |
| 我国古代第一部教法专著 | (137) |
| ——王筠的《教童子法》 | |

古代音乐教育的回顾与反思	(151)
古代快乐教学的轨迹	(182)
蒙学课程特点纵横谈	(207)
历代蒙学教材述评	(229)
· 故论 ·	
渊源·经验·规律	(244)
——中外德育艺术思想的历史考察	
国情·民情·学情	(261)
——历代家教论纵览	
后记	(279)

• 引论 •

中国蒙学精华概述

中国古代的“蒙学”，即启蒙之学，大体相当于今天的小学和中等学校的部分阶段。蒙学教育源远流长，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今天我们剔除其糟粕，继承其精华，对发展社会主义教育事业，仍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从教育目的、内容、入学年龄看古代蒙学教育的衔接性

在我国教育史上，一个人接受教育的过程被划分作小学、大学阶段。关于入学年龄的文献记载：如《大戴礼记·保傅》指出：“古学者八岁而出就外舍”，“束发而就大学”。这是说儿童八岁就离家上小学，年满二十即进大学。又如《尚书大传》说：“年十三岁入小学，见小节而践小义；年二十入大学，见大节而践大义。”再如《汉书·食货志》云：“八岁入小学，学六甲五方，书记之事”，“十五入大学，学先圣礼乐”。上述小学大学阶段的年龄起迄不尽一致，其中“古者八岁入小学，十五入大学”则是一种通常沿袭的说法。

以教育内容和教育目的为划分小学与大学的标准，才接

触到问题的实质。宋代蒙学家吕大临认为，“小学之教，艺也，行也；大学之教，道也，德也。礼乐射御书数，艺也；孝友睦姻任恤，行也；自致知至于修身，德也；所以治天下国家，道也。古之教者，学不躐等，必由小学，然后进于大学。”^①这一番话既点明了教育目的，又交待了教学内容，小学大学，一目了然。元代蒙学家许衡的说法更兼顾入学年龄和教育内容两要素：“古者民生八岁，……入小学，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及其十有五岁……入大学，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②

对小学和大学教育目的、教学内容论述得最精辟、最深刻，当推大教育家朱熹。“古者初年入小学，只是教之以事，如礼乐射御书数，及孝弟忠信之事；自十六七入大学，然后教之以理，如致知格物，及所以为忠信孝弟者。”^③“小学是事，如事君、事父兄等事；大学是发明此事之理，就上面讲究所以事君、事父兄等事是如何。小学之事，知之浅而行之小者也；大学之道，知之深而行之大者也。”^④这就是说，小学是大学的基础，大学是小学的升华。今天，我们以批判的眼光看，朱熹所确定的小学阶段的教育，是要儿童学会遵循封建伦理道德，而大学阶段则要青年把这种道德深化为内在的自觉，以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地。

论及小学与大学两者的关系，历代蒙学家特别强调小学的重要性，儿童教养步入正道，被视为至高无上的功业德

①张伯行：《小学集解·小学据说》。

②许衡：《小学大义》。

③张伯行：《养正类编·小学》。

④张伯行：《小学集解·小学据说》。

行。之所以如此，就在于小学乃是“作圣之基”。“故学圣人之道，必自小学始，否则虽欲勉焉进于大学，犹作室而无基也，成亦难矣。”^①几乎所有蒙学家都一致主张，小学教育的过程，是立大本的过程，“大本既立，然后大学功夫循序而进，无往不通。”^②借用朱熹的比喻说，小学教育是要做成圣贤坯模，而大学教育只不过是“就上面加些光饰”，“点化出些精彩”而已。

二、从课程、教材、教法看古代蒙学教育的综合性

在小学与大学课程设置上成就最大、影响深远的还算元代程端礼的《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史称“进学规程”或“读书工程”。作者撰写这一专著的意旨，在于遵循朱熹“读书明理”的主张：纠正当时学生“失序无本，欲速不达”的缺点；改造“曾未读书明理，遽使之学文”的偏见；要求读书有次第有方法，“使理学与举业毕贯于一”。全书共三卷，有的规定读经程序，有的规定学史学文程序，有的规定明辨音义法和朱子读书法。《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可说是元明清三代最典型、最权威的“教学计划”，其主要特点：第一，是注重基本功训练，开始即重视读书烂熟，注意字音字义，要求认真抄书；第二，是读书集中专一，读经读史读文先后有序，不得紊乱；第三，是强调经常复习与考查，既保持温故知新的传统效益，又发挥自制五种表格的创新作用。所以说，这一巨大而务实的“教学计划”，对当时及后世家塾教育的整体意识产生了积极影响。

清初蒙学家陈瑚，曾编写《小学日程》、《大学日

①、②伯张行：《小学集解·小学辑说》。

程》、《内训日程》。而《小学日程》^①是他依据孔子的“弟子入则孝，出则悌”教育原则勾勒成篇的，并把它具体分解为“入孝之学”、“出弟之学”、“谨行之学”、“信言之学”、“亲爱之学”和“文艺之学”6个部分，43个项目，既简且明，可守易从，进而达到蒙以养正、学作圣贤的教育目标。

在《小学日程》的编写上，作者以三言、四言等韵语形式，并用两两对比模式，极其鲜明地将正误是非呈现儿童眼前，铭刻心坎，使他们获得正确答案，摒弃错误言行。如“敬事师长，不敬事师长”；“终日勤学，终日闲旷”。这种以扬善而从并包含正面教育的启发诱导，是符合儿童心理特征和学习规律的。《小学日程》篇帙虽短，但都关乎课内外日常行为，切于实用，尤当幼童较好的课程标准与学习大纲。

如果把《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与《小学日程》相比较而论，前者《分年日程》对家塾教育分段授课的整体意识强化，产生过深远影响；后者《小学日程》在课程设置的系列化，具体化，亦有着不小的积极作用。

在古代小学教材的编写方面，蒙学教育却有着十分广泛的内容，一些小学教材采取类书的形式，即运用近似百科全书的编写法就说明这一点。譬如，在教材里有关天文地理、岁时节令、文事科名、饮食服饰、珍宝器用、文具武备、制作技艺、农桑水利、鸟兽虫鱼，甚至释道鬼神，无所不有。著名的中国教育史专家毛礼锐、沈灌群教授就把古代小学教

^①《小学日程》、《大学日程》、《内训日程》收入《圣学入门书》一书。

材分为 5 类：①综合性蒙学教材，以《三字经》为代表；②伦理道德类蒙学教材，以《性理字训》为代表；③历史类蒙学教材，以《十七史蒙求》为代表；④诗词歌赋类蒙学教材，以《训蒙诗》为代表；⑤名物制度和自然常识类蒙学教材，以《名物蒙求》为代表。①

我国古代蒙学教材浅显的特征，不仅表现在它所包括的范围上，同时，也体现在它表达的形式上。为了使儿童的识字、阅读不至于太简单枯燥，古人成功地编创了《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之类的教材。这类教材的共同特点是句短谐音，琅琅上口，极富情趣，便于记诵。对此，从《弟子职》的作者直到近代的章太炎，几乎所有的蒙学教育家都无一例外地认为韵语是训蒙的最好形式。历史上那些影响最久、使用最广、生命力最强的蒙学读本，亦无一例外都是采用韵语这种形式编辑而成的。

历代蒙学家对古代小学教材的重视，除了基于对蒙学基础性意义的认识以外，还因为他们正确估计到绝大多数儿童并无受大学教育的可能。小学阶段，既是蒙童受教育的开始，也是受教育的终止。这批蒙童接受教育的结果，仅仅是要掌握最低限度的，或日常最必需的读写能力，而不是格物穷理之类更大功能。因之，蒙学教材内容的综合化和编写形式的多样化便应运而生。

中国传统蒙学的精华，集中体现在训蒙方法上，这里主要是指教学原则与教学方法两方面。当历史的进程宣告传统蒙学教学内容中很多成分已经过时和陈腐之后，在长期教学

①毛礼锐、沈淮群主编：《中国教育通史》卷三，1987年版。]

实践中所摸索出来的并被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训蒙方法，却因它具有相对的超然性，依然值得我们批判地继承与借鉴。

量资循序一直是蒙学教育的一项重要原则。无论塾师与家长，都必须根据子弟的资禀，循序渐进。清代蒙学家崔学古说得好：“不必性急于一时，而在操功于悠久，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毫不放空，亦不逼迫，优而游之，使自得之，自然慧性日开，生机日活。”^①在漫长的教学甘苦中，教师依据学生资禀总结的经验是：如果能授二百字，只授一百字，能念十行，只与之七八行，“常使精神力量有余，则无厌苦之患，而有自得之美。”^②从一定意义上讲，少授专精的教学方法与量资循序教学原则相关联。几乎所有谈论训蒙的书，都强调教授学生古书文不在多，而在于精熟。要时常让学生不感到多，不感到难，保持信心，不断进取。

训蒙方法中最值得称道的，是尊重儿童年龄和生理特征，提倡顺应天性的快乐教学。这可以看作是孔子“因材施教”原则的具体体现。明代蒙学家王阳明最典型地指出：“大抵童子之情，乐嬉游而惮拘检，如草木之始萌芽，舒畅之则条达，摧挠之则衰萎。今教童子，必使其趋向鼓舞，中心喜悦，则其进自不能已。”^③他主张歌诗、习礼和读书的目的，不仅在于发其志意、肃其成仪与开其知觉，而且还在乎通过寓教于乐，使儿童的天性得以充分地表现，儿童的身心

①② 崔学古：《幼训》。

③ 王阳明：《训蒙大意》，

特征，在这里最大限度的得到正常发展。正是基于这一观点，我们也以较多篇章，集中论述“学是学此乐，乐是乐此学”的传统经验。由此可见，蒙学教育的对象，决定了基础教育的原则与方法；传统蒙学教育的成功，就是把这些基本原则与方法，渗透在蒙学教育的各个阶段。我们还应该清楚看到，即是蒙学教育中精华所在的训蒙法，其意义也是非常有限的。

三、从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关系看古代蒙学教育的整体性

蒙学教育和大学教育，都是在儒家思想指导下进行的。两千多年来，“养正于蒙，圣功也”的办学方针与宗旨，经过一代又一代的塾师努力，以期实现。其最终目的在于化民成俗，促使学生养成封建伦理道德习惯，进而巩固封建社会的秩序。

很显然，儒家教化的范围并不局限在蒙学教育，也不一定非要塾师全部承担。比如，清初学者陆桴亭在《论小学》一文曾说：“教小儿，不但是出就外傅之教。凡家庭之教最急。每见人家养子，当其知识乍开时，即对教以打人骂人，……此等风气，沁入心腑，人才何缘得成材。”这说明蒙童教育不是单靠学校教育即算了事，在某种意义上相比，有时家庭教育反而显得更为突出，最为急迫。这里主要强调私塾蒙师的教育，不能完全替代家庭教育。

清代蒙学家崔学古进一步指出家庭教育不能干扰或抵销蒙学教育。他说：如果“馆以内，师傅制之，馆以外，父兄制之”，将出现“师傅严于馆，而父兄狎于家，亦为暴寒相间”^①的矛盾情况。这番话道出了馆内师教与馆外家教都要互

^①崔学古：《幼训》。

相配合，不能以家庭之教压制师傅之教，更无须以“父兄狎于家”来冲击“师严于馆”，使蒙童处于“暴寒相间”，无所适从。

陆桴亭还简明而深刻地点出了家庭教育与政治教育的关系，他认为：“家庭之教，又必原于朝廷之教。朝廷之教以道德，家庭之教亦以道德，朝廷之教以名利，则家庭之教亦以名利。”这里所指的“朝廷之教”即“政教”之意。它代表封建统治者的意识形态，而家庭之教的具体内容，则以朝廷之教的目的要求为转移的。所谓“人君之治，莫大于道，莫盛于德，莫美于教，莫善于化。”^①学校教育不过是整个社会教育的组成部分，换句话说，学校教育只是整个社会教育的集中体现或典型反映。

^①王符：《潜夫论·徵化》。

蒙学传统与整体教育

一、我国历代蒙学论者的教育整体观点

我国历代蒙学教育整体发展论的观点，在培养目标，因人立教，快乐教学，综合发展和学校衔接诸方面，均有所论述，并很有特色。

1、培养目标的整体教育观

《易经》：“蒙以养正，圣功也。”这句话是说，将蒙昧无知的学童培养成为通事达理的人，正象有圣贤一样的大功啊。“蒙以养正”是封建社会培养蒙童成才的唯一目标，即要求他们具有封建正统德性的品质和修养。“圣功”二字的含义，除去教育制度的“可行性”，蒙学教材的“适度性”，还包括施教育方的“合理性”。清代蒙学教育家陈宏谋在《养正遗规》的“序言”中曾这样说：

“天下有真教术，斯有真人材；教术之端，自闾巷始，人材之成，自儿童始。”

这段文字可谓“义至深矣”，其义深在于：一、揭示“真教术”与“真人材”关系；二、论述教术多出于闾巷私塾；三、指出全面育人应自娃娃抓起。持这种同一观点的蒙学

论家亦相继提出：“教小儿当以正，不引得正，后便难了，如字画端楷之类是也。”^①“蒙师失，则后日难为功，蒙师得，则后来易为力。”^②“且人生平学问得力，全在十年内外”，“工夫得失，全赖蒙师”。^③这些论断，从不同侧面都把学童成才与延聘蒙师紧密结合起来；和正确认识蒙师的社会劳动价值联系起来。故而，不少蒙学论家感叹系之曰：“人仪知尊敬经师，而不知蒙师教授幼学，其督责之劳”，“耳无懈听，目无停视，唇焦舌敝，其苦于经师数倍”，“夫蒙师劳苦如此，关系之重又如此，岂可以子弟幼小，因而轻视先生也哉”。^④对此，他们一致呼吁：“为师难，为蒙师更难”，“甚矣，不可不慎也”^⑤；“非品端学优而又勤且严者，不克胜任”^⑥。

具有上述培养目标整体观点的，虽属少数有识之士，却代表着广大民众的利益和心愿。遗憾的是，竟不为当时封建统治者重视和采纳，致使为“圣功”而奉献的千百万蒙师，成为等而下之的“小儿王”，朝夕忙碌，默默无闻。“前车之鉴，后事之师”，重温历代蒙学家的整体教育观，应该引起我们深沉的历史反思。

2、因人立教的整体教育观

一些贤明的蒙师在讲授时，他们早已革除“出之我口，入童子之耳，便算了事”的弊端，开始了解学童，因人立教。在培养人才“望子弟为鼎甲”的同时，极为关注资性敏

^①朱熹：《语类卷》。

^{②③}崔学古：《幼训》。

^{④⑤}唐彪：《父师善诱法》。

钝的差别，并采取相应切实的教学措施。

第一，教术多样，因人而施。清代蒙学家在专著中指出：“子弟八九岁时”，“即与逐句讲解”，“资性高者，一讲即明，其未敏者，日与讲论久之亦可渐晓”^①；稍长后“讲又不必尽说正义”，“如弟子钝，此时合为一句讲之，若尚未解，只可逐字讲之”^②。这里的“一讲即明”与“讲论久之渐晓”，“讲不必尽说”与“只可逐句讲”等不同教术，体现了因人立教的教育主张。

第二，讲解课文，因人而异。根据学童资性敏钝高低，蒙师给他们规定的讲读课文也不强求一致。《幼训》作者崔学古的经验是：遇生徒资之敏者，每教两三遍，须令自读一遍再教；遇资之最钝者，须逐教读一遍，令本生自读五遍，方教下句。因儿童智力不等，教师的讲授次数与儿童的自读遍数，均以使其理解课本内容为宜。这也是因人立教的方法之一。

第三，学习难度，因人而定。《教童子法》一书的作者王筠，对此亦有实践性总结。他指出：“才高者，全经及国语国策文选尽读之，即才钝，亦五经左传全读之”。这是从学习的广度给不同学童划出一个最低标准线和较高理想线。同时，他还为智力悬殊的青少年制定各自的学习适度。他主张：“才高者，十六岁可以学文，钝才二十岁不晚。”

第四，扬长抑短，因人而用。在因人立教方面，有见地的蒙学论家同样关注儿童个性的正常发展，以达到生活道路上避恶趋善的目的。他们以蒙童的敏钝作例来说明自己的整体观

①崔学古：《幼训》。

②王筠：《教童子法》。

点：“极慧者，必摘其短以抑之，则不骄”；“极钝者，必举其长以扬之，则不退”；“倦者必加以礼貌，则不鄙”；“稍长，必砺以蒙工，则不佻”^①。这里从原则高度上，提出了对待三种类型学生的教育手段：一是聪明的子弟，要多指出他不足之处，使其不骄不躁；二、是钝笨的子弟，要多表扬他的优点长处，使其不馁不退；三、是对于涣散懈怠的子弟，应给予学习仪礼的教育，以免其品质低下，待到年龄稍大一些，更要他磨练理书默书基本功，以免其堕入偷窃歧途。

为什么历代蒙学家对于因人立教如此重视？主要是他们深知这与开发智力大有关系。有远见的蒙学家这样认识：“盖心之虚灵知觉，人人完具，第患开关启锁之无人，聪明乃蔽耳。”这句话指明了，人一般来说其智力大体相同，关键在于谁能启迪儿童智慧之门，引导他步入聪明之路，这就是因人立教的理论基础。有的蒙学家至诚相劝蒙师：“止事扑责，徒张威势，适足以锢其灵机，何能开豁其慧性，今愿为父师者，须识得此意”^②。这话讲得何等好啊！免除消极因素——“止事扑责”，制止教育恶果——“锢其灵机”，转化为最佳功效——“开豁慧性”。这难道不是苦口婆心的给蒙师辅导教育学理论吗？

3、快乐教学的整体教育观

古代“头悬梁，锥刺骨”的苦读形象曾经有过一定的影响，但不少蒙学家却主张快乐教学。王阳明的《训蒙大意》，从儿童心理方面指出了快乐教学的至关重要。他说：

①②植学古：《幼训》。

“大抵童子之情，乐嬉游而惮拘检，如草木之始萌芽，舒畅之则条达，摧挠之则衰萎。今教童子，必使其鼓舞，中心喜悦，则其进自不能已。”

这段话从“乐嬉游”、“惮拘检”儿童心理着眼，善教者能使其“鼓舞”、“喜悦”，受教者将会出现“身不由己”的进步，宛如萌芽草木，舒畅条达，生机蓬勃。

《陆桴亭论小学》，深为蒙学家所熟知，所传抄，书里描绘两种截然不同的教学现象：一为“蒙师惟督句读，则学者苦于简束”，“无鼓舞入道之乐”；一为“教童子歌诗习礼，发其志意，肃其威仪”、“歌诗近于鼓舞”，“所以诱其入道也”。不言而喻，作者的观点和态度说明他赞同快乐教学法，并批评“今之社学，止以句读简束童子，固失鼓舞之意矣”。

王筠的《教童子法》，更加重视课堂教学的乐趣，他提出：“人皆寻乐，谁肯寻苦，读书虽不如嬉戏乐，然书有乐趣，亦相从矣。”王筠还以学生学习时有无趣味来评定良师或庸师，他的评估标准是：“观其弟子欢欣鼓舞，侈谈学问者，即知是良师也，若疾首蹙额，奄奄如死人者，则笨牛也，其师将无同。”

晚清梁启超作为各科教学法专家，对于快乐教学也甚感兴趣，他认为：“教育事业，从积极方面说，全在唤起趣味，从消极方面说，要十分注意，不可以摧残趣味。”^①他的教育观点是：“我们主张趣味教育的人，是要趁儿童趣味正浓而方向未定的时候，给他们一种可以终身受用的趣味。这种教育办得圆满，够令全社会整个久永是有趣的。”^②这

^{①②}梁启超：《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

些话无疑是对快乐教学的引申和扩大，他竟然把学生学习、学校教育和社会发展融为一体而进行论述，实属可贵。

4、综合发展的整体教育观

我国历代蒙学家深知蒙学是培养人才的基础教育，他们按照封建社会的要求，以蒙师教育观为指导，使少年儿童在德、智、体诸方面得到相应发展。明代教育家王阳明就观察出各科的和谐调节，可以促使学生身心的全面发展。他以诗歌、讽诵、习礼为例，扼要阐明教育的整体功能和各科间的联合效益。王阳明这样说：

“故凡诱之歌诗者，非但发其志意而已，亦所以泄其跳号呼啸于咏歌，宣其幽抑结滞于音节也；导之习礼者，非但肃其威仪而已，亦所以周旋揖让，而动荡其血脉，拜起屈伸，而固束筋体也；讽之读书者，非但开其知觉而已，亦所以沉潜反复而进其心，抑扬讽诵以宣其志也。凡此皆所以順導其志意，调理其性情，潛消其鄙吝，默化其粗顽，日使之渐于礼仪而不苦其难，入于中和而不知其故，是盖先王立教之微意也。”^①

王阳明的儿童教育思想在这里表现得比较完整。概括言之，就是通过“诱之歌诗”，“导之习礼”，“讽之读书”，来培养儿童的道德情感，发展儿童的智慧，增强他们的身体素质。详细而论，从积极方面看，歌诗可以宣畅精神，陶冶情感；习礼可以舒展筋骨，活动血脉；讽诵可以抑扬音节，宽虚心意，最终以达到聪明日开、德性坚定的目的。从消极面看，歌诗则可避免毋躁而急，毋荡而嚣，毋馁

^①王阳明：《训蒙大意》。